

戴震乡试佚文及其交游、学术新探

□ 厦门大学历史系 方勇骏

摘要 《乾隆壬午科江南乡试诗四房同门录》一书收录戴震乡试制艺三篇,为修订本《戴震全书》及《戴震全集》所未收。此书为研究和考察戴震生平、戴氏与段玉裁的交游、戴氏与江永的学术渊源以及清代考据学风对科举的影响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关键词 戴震 八股文 考据学

中图分类号 G27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4-8-8

清代以来,戴氏文集、全集已有不少刊本。1994年,安徽古籍丛书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重新编订《戴震全书》,广泛搜集东原遗著,力求完备,并进行精心校注。2010年,黄山书社再版此书,推出修订本,在剔除初版误收文字的同时,增收戴氏佚作五篇,以存吉光片羽。笔者近来在温州市图书馆查阅温处一带的乡邦文献时,得读《乾隆壬午科江南乡试诗四房同门录》(以下简称《同门录》)刻本一册。书中收录戴震参加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江南乡试时所作制艺三篇,为此前出版的修订本《戴震全书》所未收。这三篇佚作虽皆为应举之文,却是研究戴震生平、交游和学说的珍贵材料。

一、《同门录》简介

《同门录》一书刊刻无多,传世者极少,温图所藏恐是海内孤本。此书原由近代南田(原属青田县,后划入文成县)乡绅刘祝群(1877—1951)在乡间偶然访得,1949年被捐入温州籀园图书馆。1936年,浙江省教育厅和省图书馆联合筹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在全省各行政督察区设立征品分会,广泛征集展品。分会名义上由各区行政督察专员领导,具体的征集工作则交由本地宿儒名士负责。刘祝群即为当时丽水地区征品分会的总负责人,为此,他专门走访旧处州府属各县,寻访

高且较为清闲的官位,因此,士族不用耗费更多精力在入仕与政治方面,具有极为充沛的剩余精力。

其次,世家大族经济实力雄厚。多数士族都经营着很大的庄园,庄园面积可达方圆数十里,因庄园中有很多佃客与部曲可供驱使,所以,庄园中具有齐全的生产门类。比如,喜爱旅游的曹魏时期竹林七贤均拥有属于自己的大庄园。优越的经济条件,为其外出游玩与饮酒对诗提供了更多的财力、时间及精力^[9]。

2. 崇老庄、尚自然。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于19世纪提出“回归自然”的理念,而我国自古就有这一说法。庄子提出的“勿以人灭天”就是说人要回归自然。人只有在自然中,方可感悟生命的充实与自由,人生的价值及生命的意义,魏晋时代该领悟有着更深刻的含义。

首先,阶级矛盾在西汉中期更为激化,在当时,儒家思想显得苍白无力,缺乏统治人心的强大力量。尤其是曹魏时期,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曹子建崇尚玄虚,而魏文帝则慕通达等等,彻底打击着儒家思想。但是当时大力发展士族经济,区域间缺乏经济联系,占据当时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所以,为发展自然经济,巩固世家大族地位,庄子提出了“无为”思想,强调对“无为”、“自然”及“虚淡”的崇尚,并与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11]。

其次,魏晋南北朝血腥的屠杀,让更多文人胆战心惊。汉末时期士大夫、官僚与太学诸生,有的被杀,有的被捕,还有的被禁锢,甚至出现株连九族的现象。面对该屠杀形势,既将文人的嘴死死封住,也打碎了文人的心。自此文人不敢论政,唯有游山玩水,闲谈取乐而陶冶心性。

乡邦遗献。《同门录》卷首有刘祝群所撰题识,略述得书过程及本书刊刻缘由:“丙子夏四月二十二日,诣石溪,谒端木叔总先生墓,继寻陈史瞻先生故宅。六世孙酌仙导观遗书万卷,丛残不可董理,于故纸堆中搜得乾隆壬午科吾邑韩湘岩先生《分校江南乡试诗四房同门朱卷》一本。按,湘岩先生乾隆庚辰至乙酉三科皆分校乡试,戴休宁、段金坛皆出其门下,为士林佳话。此本中有湘岩拟作及东原应举三艺,弥可珍贵。”

清代各省乡试于主考官下设同考官,亦称房官,俗称房师,分任阅卷之责。乡试同考官一般从本省进士举人出身,文行素优的州县服官中选拔。各省同考官人数不一,江南乡试由安徽、江苏两省合闱,额定十八人,分掌十八房。据赵翼《陔余丛考》记载:“本朝酌定中制,易、诗各五房,书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共十八房,相沿已久。”^[10]《同门录》即为其中“诗四房”中举者的闱墨合刊,刊刻工作由壬午科江南乡试诗四房同考官韩锡胙主持。同考官在乡试结束后,荟萃刊本房中式程文,结成房卷,这一现象从明万历年间以后变得相当流行,顾炎武也因此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之叹。

二、戴震、段玉裁、韩锡胙三人关系新探

韩锡胙(1716—1776),字介屏,号湘岩,青田人,乾隆十二年

而魏晋时期篡权现象继起,频发内祸,很多无辜的读书人死于无名刀下,像杨修、孔融、丁仪等人均亡于魏,而张华、嵇康、陆机、潘岳等人均亡于晋,届时若想保全性命并非易事。基于这一形势,魏晋士人或高谈老庄,或装聋作哑,或归隐田园,也就不足为奇。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半退隐、退隐及亦官亦隐之风的兴盛,可谓“是时毁冕裂冠相携持而去之者,数不胜数”^[8]。并以老庄理念为精神支撑,纷纷在山林佳迹处归隐。例如,王徽“龙居深藏,与蛙虾为伍”和“素无宦情”、宗炳终不为官,戏于山水等等。虽然魏晋南北朝“隐士”形形色色,各有千秋,但终究是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并以游山玩水为其直接表现。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出现的旅游热,在某种程度上升华了旅游的内涵,对思辨力度予以强化,逐渐形成以道家逍遥游为风向标,并遵循儒家“比德”思想的旅游指导理念,并形成以旷达风流、抒情色彩、宗教及浓郁思辨为特征的旅游风格。通过旅游,加速了山水画、山水文以及山水诗的成熟与精致。很多旅游景区也因此得以开发,即使在当今,其建设成就也令后人获益匪浅。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但是却是最富于智慧、热情最浓、精神极度解放的一个时代。

参考文献

- [1] 王俊峰.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旅游发展的原因[J]. 兰台世界, 2014(12).
 - [2] 晋书·阮籍传[M].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1986.
 - [3] 陈文. 东晋旅行家谢灵运游山水的旅游观念考证[J]. 兰台世界, 2014(18).
 - [4] 范晔. 后汉书·仲长统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1986.
 - [5] 胡坚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浙江森林旅游研究[J]. 浙江林学院学报, 2004(3).
- ★作者赵庆梅为重庆城市职业学院讲师。冉小平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1747)中举 历任山东平阳、禹城、平原、济河、莱阳、江苏金匱、宝山等县县令 迁安庆、松江、苏州知府。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 拣发江苏候补知县。是年秋 充恩科江南文武乡试同考官 段玉裁出其门下。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 任金匱县令。是年秋 充江南乡试同考官 戴震出其门下^[4]。戴震乾隆二十年(1755)入都 与纪昀、钱大昕、王鸣盛、朱筠等辈论学订交 名重京师 但与其高足段玉裁相识却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当时戴氏入都会试不第 居于新安会馆 段氏始从其问学 并执弟子礼。而在此之前 段、戴二经师先后举于江南乡试 并同出韩锡胙所分校之房内。师徒共一房师 这在同门观念极重的清代实是一段佳话 也为考察戴、段师徒二人交游与互动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段玉裁撰《戴东原先生年谱》时 实际上早已点出韩、戴、段三人早年的关系 只是后来的研究者少有注意这一史料：“(乾隆二十七年)举于乡。考官为嘉兴少司寇钱先生东麓 讳汝诚 大庾戴太史笈圃 讳第元。同考官为金匱县知县青田韩先生介屏 讳锡胙。钱、韩二先生 即庚辰恩科玉裁之座师、房师也。韩先生尝语玉裁曰：‘闻中闻东原卷 文笔古奥 定为读书之士。榜发 窃自喜藻鉴不谬’云。”^[5]由此可见 钱汝诚和韩锡胙是戴震、段玉裁二人共同的座师和房师 且乡试结束后 韩锡胙曾向段玉裁表达了对戴震的赏识之情。此乃戴、段订交之前不容忽视的一段因缘 不可不为表出。

三、《同门录》所见清代考据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同门录》卷首载有房师韩锡胙及本房所出七名举人的姓氏、字号、籍贯、科名、住址等信息 附刊韩氏向主考官荐卷三十七人的姓氏、籍贯和科名。是科出韩氏门下七人分别为 程沆 第三名 丹徒人；戴震 第二十九名 休宁人 项为材 第六十九名 歙县人；汪镜堂 第七十七名 镇洋人 钟晋 第九十名 华亭人；毛景云 第九十八名 怀宁人；汪苏 一百五十五名 歙县人。《同门录》主体内容即为以上七人首场首、二、三题的闱墨(汪作仅存一篇) 每篇间有主考官钱汝诚、戴第元的尾批以及韩锡胙荐卷时所作圈点、夹批和尾批 除此之外 韩氏也拟作首场首题一篇 并附有钱、戴二主考和内监试官高县圃的尾批。清代乡会试首场三题大多试以四书文 首题用《论语》 次题用《学》、《庸》 三题用《孟子》。四书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二、三场的五经文和策论 故闱墨、试录之书多只刊印前者。

壬午江南乡试首场三题依次分别为《乡人雉朝服而立於阼阶》 出自《论语·乡党》；《禘尝之义》 出自《中庸》；《远方之人 为食》 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属多句大题 原文为“‘远方之人 闻君行仁政 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 捆屨 织席以为食”。从试题来看 主考官的命题方式显然受到当时考据学风的影响。二题《禘尝之义》直接询问古宗庙礼制 要求士子具备良好的经学功底。首题用《乡党》篇更是直接体现了考据学对科举领域的渗透。清代出现考据派八股文之风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论语·乡党》篇的考证。《乡党》篇涉及朝制祭礼、饮食服物 对名物制度多有涉及 恰恰朱注于此章最为疏略 历来聚讼不断。同时 清代对《乡党》文的限制最为宽松 可以不遵朱注 旁引经史 朴学家可以自由发挥其考据工夫^[6]。乾隆二十一年(1755) 戴震老师江永(1681—1762)撰成《乡党图考》一书 他在序言中写道：“经籍包络三才 制度名物特其间一支一节 四子书《乡党》一篇稍涉制度名物 亦千百之十一。从来为制艺者 往往难之。”^[7]在经史考据学风大盛之时 偏好考据学的主考官往往会选择《乡党》为题 作为应试者“经学浅深之左券”。除此之外 主考官和房师韩锡胙对戴震制艺的所作批语也表明 以注经之法创作八股文 已经为时人所接受并得到认可。

四、戴震乡试佚文与江永学术思想之关联

《同门录》中收录的三篇戴震乡试佚文 不仅是考察戴氏生平、交游和学术的珍贵史料 同时也可从中一窥清代考据学风对科举制艺的细微影响 拥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兹选录戴震所作《乡人雉朝服而立於阼阶》一篇 藉以略窥戴氏制艺之大旨：

“诚敬接于乡人 即一雉而见礼仪之尽焉。夫夫子以诚敬与乡人接 詎雉也而或忽诸？立于阼阶 正其礼也 必朝服 谨其仪也。且礼之行于乡 皆王道所乐与乡之人共之也。由是相习而成俗于乡 正圣人与乡之人将之者也。故事属礼典之微 久矣为众之所忽 而圣人当之 俨然德盛礼恭之至著焉。何言之？圣 诚而已矣。以圣人而与乡人接 雉亦其一端也。凡出于先王之制 则礼虽细亦巨 而率百隶而时雉 掌于方相氏 固不得谓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之象 徒以狂夫为之 而遂置之不足数(夹评 笔可屈铁)。凡沿于习俗之常 则义虽重亦轻。而遍国中而大雉 命于季冬月 初何尝非春以助阳、秋以抑阴之余？亦令小民终之而乃不觉即于玩。

吾夫子退朝而家居 盖待乡以诚 而与之接也以敬。时而雉也 乡人相蹈于礼俗而至乎子之室 子之莅其至也。服必朝服焉 立必于阼阶焉。或曰存室神也 或曰非也。今夫雉之为礼 在乡人以为此所以为一室之内谋也。而自子视之 以除阴阳之沴 则天事也 以奉典物之存 则王事也(夹评 奥衍自成一子)。重之以天事、王事 则朝服宜行之于子之室 则立于阼阶宜。人惟不见于大也 而后辄目之为小。使雉而果域于卑 近古圣王何屑屑焉岁取其三时而咸为之？夫王者之政 春生而秋杀 阳开而阴闭 既不使偏于所向 而又默寓其扶阳之意于为天下消患弥灾之顷 然而见或不及此也(夹评 长句耐人思绎)。自子之肃然以临 而王政法天、王政寔能辅天者 皆可与乡人共明之。

人惟因人慢其事也 而复因事慢其人。使乡人雉而果邻于鄙褻 古圣王何兢兢焉先之以国雉而自为之？夫王者之政 无事先之以身 亦无事不及于民。既以为民之故行于国 而又显呈其重民之念于使天下驱除厉之中 然而久已慢乎此也。自子之懔然以对 而政无偏惠 民斯无礼天者 常愿与乡人共膺之。此朝服而立於阼阶 所为必诚必敬也。倘以为存室神也者 彼大夫祭五祀 士祭其先 有常服矣 而同乎燔如之度 胡为乎 则非主于室神 故而盛其仪可知矣。谓乡人而至乎子之室也者 则平日之三揖 至于阶三让而后登 有恒节矣 而不殊待立于君 胡为也？则非徒以乡人故而重其礼可知矣。吾夫子与乡人接而德盛礼恭之随事著者有如此。

大主考原批 清思一缕 层引不穷 颇似徐、艾笔意。

直写胸中所见 竟似汉人经疏。若论制艺体裁 原应如此 惜难为帖括者道也。”

江永曾在《乡党图考》卷十《雉考》一文中 依据《月令》、《郊特牲》等记载 对雉在季春、仲秋、季冬三时所拥有的不同性质作出了区分 并考证季冬大雉即为乡党之雉。戴震在这篇制艺中对“雉”的解释 与其师观点有一脉相承之处。江永是清代著名经师 同时也编撰了诸如《四书古人典林》之类的制艺教材 一直试图以典章制度之学纠正明代以来八股空疏之文风。戴震乡试闱墨继承了江永融考证于制艺的一贯风格。戴震的这三篇佚文对于全面理解其生平交游、学行以及时代风气大有助益 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参考文献

- [1]赵翼. 陔余丛考[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7.
- [2]刘祝群. 韩湘岩先生年谱[M]. 启后亭石印本, 1947.
- [3]段玉裁. 戴东原先生年谱[M]. 清代徽州年谱合刊(上). 合肥: 黄山书社, 2006.
- [4]孔庆茂. 八股文史[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 [5]江永. 乡党图考·序[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作者方勇骏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